

# 流动人口的形成、制度背景与问题<sup>\*</sup>

——国外研究述评

陈小娟

**[提 要]** 全球化使得移民成为一个国际性话题，而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也使得中国内部移民——流动人口问题变得突出，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比较点。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外文献中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形成，分析了中国内部流动的特殊制度安排，以及在流动目的地城市工人阶级的现状，文章最后分析了流动中的具体问题。

**[关键词]** 农村流动人口 移民 农民工 工人 性别

**[中图分类号]** C92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114X (2010) 02 - 0166 - 07

人口流动貌似地理空间位置的改变，但是当把流动的主体——人，带回分析中，可以看到流动是地理、人口、资源基础上的结构性变化。移民研究按空间划分可以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发达国家对国际移民问题的讨论相对较多，因为他们是主要的移民流入国，面临着复杂的移民融入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两个方面并存：一是跨国人口迁移对本国造成的影响；二是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的国内人口流动。目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国内人口流动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从西方文献中寻找“局外人”的眼光，借鉴他们的视角和方法，以此提供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 一、流动人口的形成

### (一) 国内背景

在一般意义上，中国的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

<sup>\*</sup> 本文是刘林平主持的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流动与权益——珠三角农民工的追踪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姚莹、陈黎帮助收集并翻译了部分文献，特此感谢。

学术界把前一种叫做“市场转型”，后一种称为“社会转型”。这两种转型在实践上是同步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社会转型的可能和空间，社会转型又对后续的市场转型提供条件和限制。流动人口的出现既是市场转型的结果，也是实现社会转型的条件。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流动并非肇始于1980年代，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动在中国就一直存在。但这些流动并非以农业人口为主，而是出于军事、经济和政治等因素促成的被动流动。但从1980年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农村人口为主向省会城市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主动流动的高潮，并且延续至今。国外学者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流动现象的描述上。例如在 Delia Davin 和 Thomas Schaping 的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移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国家政策、推拉因素（如地区和城乡间的差异）、移民对输出地的影响（如农村劳动力新的配置方式）、城市移民的工作和生活以及移居者的大众形象、出生率、卖淫、性别比和新的长距离婚姻市场。研究总括了中国移民的主要趋势、概况、定义等，解释了移民潮特征的经济基础、社会和行政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户籍制度。并对不同区域的移民行为、就业和收入进行实证研究。其中还涉及到移民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对台湾的移民和中国大陆非法移民到台湾两者的比较研究。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开始应用中国国内人口统计数据，对农村流动人口规模、总体特征、流动模式进行了量化的研究。Harry Xiaoying Wu 用新的方法估算了1949~1990年的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分析改革前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和移民。Zai Liang 和 Michael J. White 用事件史分析法对中国1950~1988年的省际内部移民数量做出了估算，指出现有的流动事实对未来的流动趋势有决定性作用。该研究指出，技术上的创新，对于在历史性数据无法获得或不够准确的情况下，研究一国长时间序列流动模式提供了有意义的帮助。

在资料积累和统计方法发展的共同推进下，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开始走向细致化。农村流动人口以区域、人口学等特征被划分为不同的流动群体加以研究。在对流动机制的讨论中，Guanghua Wan 的研究认为，教育促进流动；距离与流动规模正相关；非正式部门吸收小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乡-乡移民倾向长期定居，乡-城移民倾向短期定居。同时，研究者们也警惕地关注到人口流动产生的社会问题。因此，提供社会福利，实施城乡一体化，改革土地产权，明确乡镇企业的地位，政府建立全国性的网络，为流动人口提供信息等等，是学者们开出的处方。

## （二）国际比较

中国流动人口的现状只有在国际移民比较中才能展现出清晰的独特性。有两组研究对此做出了尝试。Kenneth D. Roberts 把中国的农村劳动力移民放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背景中，从移民过程、在目的地的经济社会地位、耕地结构和农业发展过程产生的持续移民三方面，与进入美国的非法墨西哥移民进行比较。比较基础主要有五点：1. 移民过程是暂时而非永久的；2. 在流入和流出地之间存在生活水平和工资间的巨大差异；3. 中国城市和美国对移民劳动力定居有严格限制；4. 输入和输出地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5. 在农业产生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又将其束缚在土地上。两国同时在国家政策中都倾向于以农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保持农业低价格对城市消费进行补贴。文章最后预测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的相关问题，指出解决劳动力的持续过剩，改革户籍和控制流动人口的相关政策是关键。其中作者对移民网络在移民社区和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分析，对国内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

在类似的国际比较文章中，《中国内部移民的公民权问题：与德国和日本的比较》一文将德

国、日本和中国放在一起。选择这三国做比较是基于以下相似之处：“外来者”对三国经济贡献巨大，创造了经济奇迹；基于血统和种族的公民权决定标准将外来者和本地人进行了工作上的区分；对外来者持有共同的立场：排斥、文化优越和种族中心。在此基础上，该文从进入规则、公民权和社会权、移民个人待遇等方面比较了三国的差异，然后用发展和时机、劳工政治地位和地缘政治地位三种角度解释了三国差异的原因。

## 二、流动人口的制度安排

### （一）户籍制度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都注意到了中国户籍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并对该问题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1. 产生。对于户籍制度形成的原因，魏昂德《中国工人阶级的再造》一文的研究观点在西方较具有代表性。作者认为，1950年代的人口激增，使得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无力实现城市化。因此实施了人口控制政策来降低工作流动，形成了高就业、低工资的现状。此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求延续了该政策。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户籍制度的产生从经济上是服务于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

2. 功能。Kam Wing Chan和 Li Zhang认为户籍制度是为国家利益而存在的，是为了把人们固定在国家提供的利益和机会范围之内。其存在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公共利益，控制流动是其功能之一。C. Cindy Fan支持了该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户籍制度在中国稳固的延续服务于转型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一方面，户籍制度在控制人口流动中发挥着功能。迁移资格由政府部门决定，他们可以制定不同的标准。户籍制度规定人们应该在哪里工作和定居，人们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力。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使得非农业人口在经济上优于农业人口，具有优先的机会、权利和地位，进而造成了社会隔离和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sup>①</sup>。户籍制度兼具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功能，但这两者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消长。Kam Wing Chan和 Li Zhang的研究表明户籍制度虽然经过了各种形式的改革，但本质却未变；多重管理结构的出现，弱化了监管功能，突显了控制功能。户籍分割使社会不平等问题凸显，非农户口的人有国家福利方面的保障，而农民工只能生活在脏、累、不安全的底层<sup>②</sup>，导致其社会分层功能强化。

3. 影响。户籍制度的影响是广泛的，在流动人口群体和社会结构两个层次均有体现。但中国社会表面流动的繁荣，让人们很少反思两者的关系。吴晓刚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指出：户籍制度既保证了乡村的高流动率，又造就了中国城市表面的“开放性”。但实际数据显示这一流动仅是水平层面的流动，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仅是生命历程中的一段经历，在制度政策排斥下，流动人口没有改变最终回流乡村的命运。由于户籍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第一代流动人口在流动中艰苦的付出无法阻挡子代向下流动的命运。研究表明，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父代的城市流动和城市工作经历与子代城市就业低度关联。这一结论在世界社会学的研究中成为一种例外。吴的研究提醒“理解这一普遍的代际流动模式背后的形成机制，须要我们详细研究一个国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文章探讨了流动与不平等的关系，指出流动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而高度不平等也不会阻碍高流动。相似的流动具有不同的原因，而相同的流动会产生不同的后果<sup>③</sup>。我们需要认真分析是什么推动了流动，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即便是在国际移民比较研究中，户籍制度也是造成中国流动人口与国际移民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在

《中国移民劳动力大潮：从美国非法墨西哥移民中得到的启示》中，Kenneth D. Roberts强调中国移民比非法墨西哥移民在文化上更为孤立，原因在于墨西哥移民的子女如果出生在美国就成为美国公民，即在公民资格的获得上还有一条未被封闭的路，而在中国则无此通途<sup>⑭</sup>。

## （二）公民权和城市公共物品

Soinger借用政治学概念“公民权”，强调个体在社区中获得成员资格和资源分配的权利。作者采用市场和制度安排相结合的视角，分析指出虽然中国流动人口出现是市场化的结果，但是国家制度安排建立的结构却决定了流动人口进行行动和理性选择的限度。因此，作者指出在中国是国家和市场共同限制了农民城市公民权的获得<sup>⑮</sup>。该研究借鉴了政治学观点，在国家与民主、市场与公民权等的关系中研究移民。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市场化并不必然产生政治的民主化和公民权的实现。该概念的引入将国家、市场、农村流动人口放在宏观背景上进行研究，拓宽了学科研究视角，放大了移民研究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转型中的中国城市过渡和共产主义‘城市公共物品体制’的解体》一文探讨了“城市公共物品体制”在外来人口进入时受到的挑战。该文指出，城市公共物品体制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城市权力以外，但持续的人口流动又对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新挑战。作者的问题是：在不能维持原有城市人特权时，政府通过何种手段继续自身统治的合法性<sup>⑯</sup>？这至今还是政府议事日程之外的大问题。外来人口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挑战，而该文对此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

## （三）工人阶级

阶级属性具有延续性。现有阶级的状况是未来阶级可能的条件，所以，对农民工进行研究就会讨论到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农民工阶级是构成中国工人阶级的新主力。

### 1. 再造的工人阶级

魏昂德的研究主要探讨了1949~1981年的中国工人阶级。作者认为，这个阶段的工人阶级是一个与以前的工人阶级断裂了的新工人阶级。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不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引发中国革命，相反是革命造就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迅速的工业化导致了中国资本投资模式的改变，无产阶级化和新社会分层体系的出现，塑造了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工人阶级特点和劳工关系。社会主义使得企业成为福利供给和服务提供的核心焦点，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性。魏昂德最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社会从阶级到阶层，产生了科层化秩序中的工人。居住地和就业地位决定工人的生活机会。从而预言中国工人阶级的解体<sup>⑰</sup>。

魏昂德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1949年后他眼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享受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待遇。但是，伴随改革深化，尤其是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国有企业兼并破产，以及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使工人阶级全面丧失自己享有的特权，一部分下岗工人沦落为城市贫困人口，心理上的落差是巨大的，给社会造成的震荡也不小。因此，《霸权和中国工人政治》一文探讨的问题是：工人原有待遇恶化，为什么没有导致政治上的反抗？文章分析得出的原因是国家和市场价值观通过不同方式占据霸权地位。工人的不满主要针对个人腐败而非国家政策。同时，市场的一系列功能，比如原子化、利益多元化等同样促成了人们对市场的认同。文章在此基础上与葛兰西的观点进行了对话，指出了中国工人政治体现出的特殊性<sup>⑱</sup>。

### 2 劳工政治

虽然大规模的政治反抗没有形成，工人的不满还是在表达着。李静君对中国劳工政治进行了

比较多的研究。作者引入了一些核心概念：集体不行动、阶级体验、情绪的结构化。集体不行动是指工作中的冷漠、不顺从、逃避集体责任、缺乏热情、回避、低效率。这些是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对国家控制的逃避而非公然对抗。体验是指在巨大的、多维的、矛盾的领域，人们在自己的经历中权衡和寻找所经历的事物的意义。作者的研究以广州为个案，总结出了广州劳动力群体的特点：市场化、多元化、异质化和碎片化。在市场化进程中，作者分析了市场中工人的碎片化体验，形成了新的三种类型的工人：社会主义的背叛者，社会主义的转型者，社会主义的自由者。文章分析了改革时代实践和意识两个层面的劳工政治：通过各种形式的集体不行动模式以及新的阶级间的断裂，即阶级体验和赞同改革，来抵制原有的制度。改革时代工人政治的流动性部分根源于实践和意识之间的脱节。总之，作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劳工政治一方面在增强，一方面其构成基础在不断被碎片化。这是社会主义的经历和市场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sup>⑩</sup>。

市场的崛起削弱了国企工人建立在共同生活方式和相似生活机遇上的阶级团结基础。个体市场能力的差异与性别和来源地之间存在的非一致性，使得女性和农民工成为了次级工人。在中国工厂劳工体制变化中，国家力量下降企业和管理力量上升在本质上是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李静君在“从组织化的依赖到非组织化的专制主义：中国工厂劳工体制的变化”一文中，探讨了国有企业中改革政策、管理者和工人实践中的变化趋势。作者的基本判断是，从组织依赖走向了非组织化的暴政。一方面，随着国家财政力量对工人支持的削弱，以及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作为国家与工人之间权力关系基础的福利父权主义消失了。另一方面，工厂自主权的扩大表明了管理主导形式的形成。尤其当管理者可以解雇工人，可以雇佣大量农民工时，中国工厂劳工体制从组织化的依赖走向了非组织化的专制主义<sup>⑪</sup>。面对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转型引发了激进的工人政治，国家动用法律手段进行整合。李静君的研究指出，国家主动采用“依法治国”来合法化对工人暴动的控制，但是非组织化的专制，社会保障的差距和管理主义的上升导致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控诉，使得工厂成为劳工不满的源泉<sup>⑫</sup>。

### 三、流动中的问题

#### （一）性别

总结现有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流动人口性别问题研究集中于对国家和市场在性别建构中所起作用的争论。Lock, Riley和 Xu认为，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妇女解放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使中国性别平等化程度大大提高。而进入市场改革之后，国家权力介入削弱，市场力量强化，恶化了女性地位，使得性别劣势在市场竞争和效率原则支配下强化。Honig和 Johnson的观点则与之相对，认为1949年后的妇女解放和平等是具有政治动员性的话语，实质上对女性地位的改变并不显著，反而是市场化的改革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自主性。女性在克服性别压力的同时，挑战着既定的社会结构，改变着自身社会地位。国家和市场在性别平等中所起作用的争论，本质上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先于制度，与女性主义强调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核心地位两种立场的对立。C Cindy Fan的研究提出将国家带回到分析的中心，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强调国家在生产、分配和资源获得以及性别建构中的作用。她认为变迁不是性别中立，宏观经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性别差异的后果。转型中国在寻求经济发展中使用了社会控制工具建立了劳动力制度，该制度具有分割劳动力和制造性别差异的特征<sup>⑬</sup>。

而潘毅的研究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父权主义的深层社会背景上，讨论了中国年

青女性如何成为打工妹？这种身份对她们和社会的改变是怎样的？以及这三者如何合力打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sup>③</sup>。作者的基本立场是批判的，认为打工妹的产生和现状受制于这三重压迫，但也同时强调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因此，C. Cindy Fan和潘毅的研究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反映国家和市场在流动人口性别问题上产生消极作用的一面。与此相对，Heather Xiaoquan Zhang的研究运用定性方法，展现了中国农村女性移民自己叙说的经历，尝试了解女性迁移背后的动力，以及制度变迁和结构壁垒在女性移民过程中生活和经历的塑造。文章认为，女性在空前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是行动的主体。通过她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参与，她们对传统的性别角色以及结构规定的空间和社会经济壁垒提出了挑战。她们的行为对社会、政府和性别秩序的彻底重构具有催化作用<sup>④</sup>。研究肯定了市场在为女性提供机会上起到的积极作用。

李静君采用比较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南方制造业地区两个工厂中性别制度的产生。由同一个企业家，相同的管理者，生产同一种产品，在劳动过程中使用相同技术的两个工厂，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工厂政治。作者把它们分别称之为：地方专制主义和家庭权威主义。作者认为是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生产出了工人依附的不同条件。不同的依赖决定了控制管理策略、工人的集体实践以及工人性别的相互建构<sup>⑤</sup>。在199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性别和中国南方奇迹——两个世界中的女工》里，作者将性别放入生产政治理论中，认为“性别在组织生产政治中是重要的且首要的”，性别建构了多重制度因素，在不同生产政体中有不同的性别。研究拓展了性别研究领域也同时对劳工生产政治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为流动人口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国家、市场和制度均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相信对立的观点都展现了问题的某一方面。以上文献由于理论视角不同，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使得争论缺乏客观的比较指标，因此有待后续量化研究方法，对不同理论的解释力进行鉴别。

## （二）婚姻移民

婚姻移民的研究延续了性别研究中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争论。它在传统的观点中是与家庭相关的，并且视女性婚姻移民者为被动受限制的流动者。而“农村新娘潮：中国的女性婚姻移民”一文提出，对女性婚姻移民的分析应放在结构的框架之下，强调结构的、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要素对女性流动附加的限制和提供的机会。从经济策略的角度来看，婚姻移民的交易性本质伤害了女性的地位，但也为处于劣势的女性获得社会经济流动提供了机会。贫困地区的农村女性受制度、出生、低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限制，被排除在城市和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外。面对这些限制，许多女性以经济机会和农业工作为交换进行了婚姻移民，嫁入了较发达的农业地区或者地理位置较远的地方。尽管新经济学的论调过分强调婚姻移民是一种经济策略，但是作者认为结构方法在理解女性移民的复杂性和解释目前长距离的中国女性婚姻移民是必要的<sup>⑥</sup>。

农村流动人口的问题是中国在本世纪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都有赖这一群体的发展。借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化”理论，行动和结构是互构的，流动人口问题受制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但是流动的行动又不断建构和重构着既存的社会结构，成为再行动的条件和中介。农村流动人口是富含社会学意义的研究题目，也是中国社会中特殊的社会事实，我们希望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带着新的眼光和视角继续这一问题的对话和讨论。

---

Delia Davin, 1999, *Internal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ingstoke: Macmillan; and New York: St Mar

tin ' s Press

Frank N. Pieke and Hein Mallee, 1999 ,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inese Perspectives, Surrey: Curzon*.

Harry Xiaoying Wu, Sep. 1994,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Zai Liang, Michael J. White, 1996,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1950 - 1988". *Demography*, Vol 33, No 3. pp. 375 ~ 384.

Wan, G. H. 1995. "Peasant Flood in China - Internal Migration and Its Policy Determinan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16 (2): 173 ~ 96.

⑭ Kenneth D. Roberts, 1997, "China's "Tidal Wave" of Migrant Labor: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exican Undocumented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2 (Summer, ), pp. 249 ~ 293.

Dorothy J. Solinger, 1999, "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4, No 3.

⑰ Andrew G. Walder, 1984,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 - 1981", *Modern China*, Vol 10, No 1, pp. 3 ~ 48.

⑱ Kam Wing Chan and Li Zhang, 1999,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 -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0, pp. 818 ~ 855.

C. Cindy Fan, 2004, "The state,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maid en workers in China", *Political Geography*, 23 (2004) 283 ~ 305.

⑲ 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Sep. ,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pp. 644 ~ 668.

⑳ Xiaogang Wu & Donald J. Treiman, 2007, "Inequality and Equality under Chinese Socialism: The Hukou System an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3 No 2: 415 ~ 45.

㉑ Dorothy J. Solinger,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

㉒ Dorothy J. Solinger, 1995. "China's Urban Transient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Urban Public Goods Regim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7, No 2 (Jan , 1995), pp. 127 ~ 146.

㉓ Blecher, Marc June, 2002, "Hegemony and Worker's Politic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70: 283 ~ 303.

㉔ Ching Kwan Lee, Jan , 1998,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Vol 24.

㉕ Ching Kwan Lee, Mar , 1999,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7.

㉖ Ching Kwan Lee, 2002, "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 Labor Insurgency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1, No 2 pp. 189 ~ 228.

㉗ C. Cindy Fan, 2004, "The state,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maid en workers in Chin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3, pp. 283 ~ 305.

㉘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㉙ Heather Xiaoquan Zhang, 1999, "Female Migration and Urban Labor Market in Tianj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0, pp. 21 ~ 41.

㉚ Ching Kwan Lee, Jun ,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3, pp. 378 ~ 397.

㉛ C. Cindy Fan; Youqin Huang, 1998, "Waves of Rural Brides: 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8, No 2, pp. 227 ~ 251.

作者简介：陈小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张应祥]